

雁阵理论的再评价与拓展：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诠释^{*}

袁富华 张平

内容提要：我国经济现阶段的发展特征，意味着在向发达阶段收敛的过程中，将会继续遇到有待克服的困难，即建构内生动力和摆脱国际分工中的外围地位。更加现实的任务是，把已经偏离了线性雁阵模型的增长方式，拉回可持续的理想路径上来。立足于服务业的知识要素创造特征和发展趋势，本文对传统的工业雁阵理论进行了扩展，对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内生动力缺失的原因及其改进方向给出了诠释。

关键词：雁阵理论 转型 城市化

一、引言

比起以商品生产谋求短期利益的静态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强调以知识要素的创造来获得长期动态效率。就发展状态下经济追赶的情形而言，动态比较优势也同时体现为产业结构的梯度升级。如果把传统工业化过程的雁阵序贯加以拉长，扩展到转型及其后的城市化过程，那么我们就能够对后发国家长期追赶的路径和问题给出一个全景式观察。当然，拿发达国家的情景作为参照比较合适。通过一系列的综合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理想的服务业发展，应该是继工业雁阵充分演进之后的另一个高端，其功能是以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配置为核心，为整体经济效率的持续改善提供动态补偿。这就是我们前期研究中强调的服务业（知识技术密集）要素化趋势。

把我国经济结构和要素的动态变化，放置在上述框架中来思考，容易看清楚一些问题。正如国际分工互补原理所揭示的那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是初级劳动力要素禀赋承接国际边际产业的转移的过程。在大规模工业化接近尾声的现阶段，内部结构呈现出重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的演替，

但是工业发展自身的问题，导致了进一步升级的一些困难^①。这些困难主要体现在，受制于初等和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主导增长的状况，我国一直很难摆脱居于国际分工链条低端的尴尬处境。并且，受劳动、资本密集行业规模扩张，以及外部和内部失衡所引致的价格扭曲效应的影响，我国工业结构向高级序贯的演进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荷兰病的中国版本隐约浮现，向高收入水平收敛的门槛效应也因此发生。

借助于城市化谋求工业困境的摆脱，需要认清服务业的发展趋势。与标准化工业的规模经济不同，服务业的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创造，以及服务业行业的发展，更多带有非标准、专用性和租金创造的特征。离开了这样的发展方式，将会使得服务业发展沿袭工业化的规模路径，在新要素创造和配置环节缺失的条件下，服务业部门扩张给整体经济带来的不是效率，而是因为成本无法覆盖所导致的城市病，并迫使经济向租金抽取模式退化。

二、动态比较优势下的长期增长的一般理论与门槛效应

关于我国工业化模式及其演化趋势的认识，由

^{*} 袁富华、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fuhua_yuan1@163.com, zhangping@cass.org.cn。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研究”（12&ZD08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转型风险与国家生产系统效率提升路径研究”（14AJL006）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于观察视角的不同,国内学者之间存在不少分歧和争论^②。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以一般化的国际分工理论为分析起点,把动态比较优势应用于我国工业化经验观察,仍然不失为一条有成效的逻辑路线。这种做法的便利之处,在于提供一个以国别间中心—外围联系为背景、以国际国内产业结构雁阵序贯为主线、以城市化门槛跨越为导向的经济追赶完整图景。毋庸置疑,这些都是切合我国工业化经验的理论要点。

(一)经济追赶国家工业化线性演进路径

对于经济追赶国家以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借此使得国民收入水平(或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的理想增长路径的理解,我们打算从小岛清(1990)的精辟论述开始:“生产什么样的商品(最好是需求增长很有弹性的商品),怎样生产才能使之具有国际竞争力,以及为了这个目的怎样培养企业家,积累资本、革新技术、培训工人等,这是动态的发展局面。这个动态的发展局面在性质上不同于商品市场,然而,是它的基础;也就是生产过程和生产要素市场的问题。这里暂且把它称为‘国民生产’过程。……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过程,就意味着它的产业结构调整。因此,要有与之对应的、接纳这种调整的发达国家方面的结构调整。如能切合于下一个时点可以预见的、潜在的、动态的比较优势格局,为实现结构调整而实行国际互补,就不会同各时点的自由贸易原则相矛盾,而会使贸易量扩大。我把它称之为‘顺国际分工的国际互补’,并且提倡,应该确立的国际互补原理必须是切合于这种动态比较优势的互补。”小岛清理论的卓有成效之处,在于强调经由国际分工互补利益的充分利用,积累后发国家工业化阶段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据此构建国内产业结构梯度升级序贯,达成国民收入和效率向发达国家的收敛。基于这种假设和推论,线性追赶路径的一般化包括:

1. 工业化线性增长的理想情景。本质上,关于国际分工和经济结构的日本学派理论与拉美结构主义理论,在国别间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进而比较优势存在差异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尽管拉美结构主义不同意后发国家工业化追赶过程的线性观点^③。首先来看两种理论的交汇处的场景。与凭借资源禀赋参与国际分工的静态比较优势或自由贸易的商品市场分析不同,小岛清(1990)和其他学者(如 Ozawa, 2005)的国际分工互补假设及其推论,紧要之处在于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利用工业多样化

机会,在避免陷入不利的初级产品生产专业化和完全分工的同时,通过持续的资本深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实现资本、技术的比较劣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这是实现外围突破进而向中心收敛的关键经济实践和理论逻辑环节。总体来看,中心—外围国家间的分工和互补,一方面是以发达国家结构中(由于高劳动成本导致的比较劣势)“边际产业”的出现为条件;^④另一方面,拥有劳动力要素禀赋的后发国家承接这些产业后,不仅有利于培育追赶潜力,同时也使得中心国濒临淘汰的边际产业转化为“生产性产业”,这种转换对于中心和外围国家都有利。理想情况下,如果这种转换能顺利推进——即中心—外围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比较优势实现转移和承接,这种程序将会促进后发国家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

2. 比较优势、产业结构雁阵序贯和竞争优势。先讨论生产过程的雁阵结构。按照 Ozawa(2005)的说法,工业革命以来的国际分工和产业传递,先后经历了英国主导、美国主导以及日本主导时期。二战后日本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20世纪50年代),顺次完成重化工业规模驱动阶段(20世纪60年代)、零部件密集装配驱动阶段(20世纪70年代)、知识信息驱动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每10年就完成一次产业升级。其间,大致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根据国内成本状况和技术趋势,不断向周边国家转移比较劣势边际产业。这种“清理房间”的行动,一方面保证国内制造业竞争能力持续强化,另一方面对外投资把边际产业变废为宝,在推动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同时收获额外利益——尤其是廉价工业品的再进口,并以此确立了日本在东亚的中心—外围模式^⑤。作为二战后被广泛研究的制造业序贯升级的完整样板,日本式的线性追赶具有内生增长的一般特征。其中,规模经济和知识积累的相辅相成,可以看作这一成功经验的概括——前者提供了特定时期高速增长的基础,后者提供了创新和可持续的基础。

通常的看法是,为了建设不依赖于中心国家的工业技术能力,当步入重工业化阶段之后,在鼓励自由竞争的同时,国家对私人部门的知识技术积累进行激励,这是培育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成功经验。对此,通过对1960—1980年间日本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绩效的对比分析,小野丰广(1990)从微观方面给出的进一步说明是:“在经历了产业保护而获得竞争力之后,质量和价格成为竞争实力的关键,日本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是在国内的激烈竞争

中产生的,那些知识技术密集产业,其研发规模和人力足以抗衡世界上最强的公司;也正是因为这样,即使经历了1973年以后的经济低速运转,这些企业也可以在不利环境中生存下来。”推而广之,这种线性增长路径,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对东亚其他地区如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影响很大,逐渐形成了对日本追赶的亚洲第一梯队。

(二)城市化、要素动态与雁阵序贯的接续

知识信息密集的工业化高级雁阵梯度,这个阶段的发展伴随着服务业的发展。为此,把雁阵理论扩展到城市化阶段,对于理论分析是有益的。马克卢普(2007)建立的庞大而精细的知识生产分配研究框架,展示了二战后美国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的快速发展状况,明确指出知识生产行业超过了钢铁、石化和汽车等制造业。也许正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欧洲发达国家)被认为在服务业发展上的比较优势变得显著。从结构演化和要素动态联系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意味着国际分工格局的特征发生了质的变化,为此需要引入新的视角给出描述。

1. 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当把雁阵模型的线性思维延伸到服务业,自然的假设和推论是,作为增长主导性动力源之一,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应该表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否则就没有必要从高端工业结构向服务业演化的经济意义了。这种假设的争论在于:制造业的高端化及相应劳动生产率螺旋上升压力,正是城市化高成本造成的——除了租金之外,主要是劳动力高成本。对于后者的说明是,城市化阶段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恰恰是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标志,发达国家服务业扩张和成本上升是好事情(宫崎勇,2009),即生活质量这一国民生产目标达成了。正如休斯、凯恩(2011)对二战后美国服务业所作出的评价那样:“由制造业生产率的巨大提高滋养起来的美国服务业,来源于各种类型的教育的发展;与农业和工业不同,服务业是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教育、休闲、保健、文娱等等行业以其专门服务,提高现代生活质量。”总体来看,这些认识与马克卢普(2007)的观点一致——服务业是居于产业雁阵序贯高端的效率创造部门。

2. 工业过程以物质产品生产配置为重心,城市化以知识要素生产配置为重心。前述分析有助于我们改变看待服务业的态度。大多数文献基本上使用类比于工业部门的分析方法,把服务业的增长看作为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所付出的“必要的”成本,本质

上是工业化过程的辅助环节。^⑥但从产业结构线性演进角度看,发达城市化阶段的服务业是以知识生产配置为重心建立起来的,越来越多的服务行业表现出人力资本创造和知识创造这种“新的要素禀赋”生产配置特征,服务业发展的要素化趋势越来越显著(袁富华,2016a,2016b)。以知识为代表的要素生产,之所以被分离出来作为独立演化的高层次产业结构、并形成对制造业份额的替代,是由于:它改变甚至逆转了消费结构,多样化的专门服务不断涌现和增长,与广义人力资本有关的消费份额显著增长(课题组,2014,2015,2016)。因此,如果说工业化雁阵是以工艺和产品改变分工格局的话,那么服务业的发展就是以知识要素改变分工格局。

3. 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经济过程的演化和要素积累,最终体现在生活水平的追赶和提高上。规模报酬递增是工业化和劳动生产率追赶的主要动力。发达城市化阶段,消费需求多样性使得要素专用性的作用凸显,以非标准化、异质性和租金创造为特征的要素服务^⑦,提供了不同于规模扩大和成本下降的报酬递增形态。我们认为,这是服务业与工业的另一个重要不同,尽管知识的生产分配同时对制造业效率改进具有溢出效应。

由于加入了服务部门知识生产和创造这种特殊功能,知识生产行业直接具有了专用要素的垄断性质,它基于自己的专用属性收取报酬,而不是像普通产品生产那样通过竞争获得利益。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如果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不存在或者知识创造的功能消失,那么服务业增长替代制造业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低素质劳动力规模扩张的过程。其间,如果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足以覆盖服务业的相对价格提高,鲍莫尔成本病就会发生^⑧。

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导向的服务业的增长,更加具有未来收益预期的特征,教育既可以被作为对未来的储蓄或投资,也可以看成为了实现未来预期收益年复一年支付的沉淀成本。或许,也正是基于这种规划,使得发达国家始终保持了竞争优势。通常被认为是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却被他们发展成为高级要素供给的新源头。

(三)后发国家经济转型的非连续和门槛效应

工业化的国际比较表明,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达成结构优化的线性演进路径。通常,受制于制造业内生动力的缺失以及服务业成本病的困扰,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就停滞不

前了(姚枝仲,2014)。小岛清(1990)和 Ozawa(2005)都强调后发国家工业化追赶不仅需要发达国家边际产业转移这种外部因素,更强调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要不断积极主动培育企业家精神和人力资本这种内生要素,可惜这一点被很多追赶实践忽视了。就像休斯、凯恩(2011)强调的那样,服务业的知识创造和促进分工能力,是建立在制造业巨大生产力的积累和支撑之上,或者,应该把服务业发展看作严谨的经济规律的产物,不顾这个规律而盲目以工业化的规模方式推进服务业发展,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而当服务业确实远离了知识、人力资本要素创造功能、朝向初级劳动密集型发展,那么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雁阵序贯就发生了断裂,转型过程中非连续问题就发生了,经济效率持续改进的内生动力因此无法建立。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增长非连续和门槛效应问题,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已有一些探讨性分析(课题组,2016),这里再结合雁阵模型给出几个要点:

1. 中心—外国国际分工固化,源于后发国家对服务业要素创造功能的忽视。大规模工业化结束——紧接着由初级劳动密集型和重化工业化阶段向知识密集的深加工度阶段演替,以及服务业本应以其新要素禀赋创造功能接续比较劣势制造业的下降,这两个对转型成功至关重要的生产环节如果不能同时发挥作用,那么,中心—外国国际分工格局固化的抱怨,就会在经济追赶国家发生。但是问题不在于理想线性雁阵模型出了问题,而在于追赶国家的发展过程出现了偏离。低成本的国际比较优势固然是好的,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低成本比较优势——以创新和管理获得低成本?或者是依赖于劳动力工资压低获得低成本?后者只能导致静态的、短暂的比较利益,而且会伤及工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的潜力。

2. 租金抽取效应。一旦服务业走向类似于工业化的规模扩张路径,那么原有的依赖工业规模报酬递增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改善的愿望也无法实现,即使物质资本积累可以持续,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也会对国民生产过程良性运作构成约束,生产的负反馈循环由此出现,最终形成低速增长时期的租金抽取效应,并进一步加剧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差异和部门异质性(袁富华,2014;袁富华等,2015a,2015b)。

3. 内部化问题。国民生产过程的结构变动和要素培育,根本上来说是内部化问题。我们的研究对内部化过程的基本结论是:通过消费结构升级与生产供

给结构的协同,推动劳动生产率的长期提高和“消费的效率补偿机制”的形成,即发展成果最终要落实到知识创造能力提高和广义人力资本的积累上,这才是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真正的源泉。内部化环节缺失,同样是经济追赶无法跨越门槛的关键性瓶颈,这个缺失性环节大多时候与大规模工业化时期偏重于储蓄和资本积累的政府干预政策有关(袁富华、张平,2017)。尤其是工业化时期劳动资源禀赋导致的长期真实工资的向下刚性,对于消费结构升级即相应广义人力资本积累构成最根本的抑制。因此,我们认为,消费结构升级状况决定了生产的扩张边界和结构调整的程度(袁富华,2016a)。

三、完全专业化、规模扩张与转型时期 荷兰病的一般化表现:我国 工业化路径及现实问题

作为线性雁阵模型(至少是工业化过程)成功的模范,按照小岛清(1990)和小野丰广(1990)的说法,日本受惠于自己的哲学和社会态度:竞争优势要建立在质量、设计和管理制度上,而不是依赖廉价劳动力。这种认识与大多数经济追赶国家初级要素驱动增长的经验相左,尽管它不一定作为经济转型的唯一指南,但足以为鉴照,尤其是在观察我国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难时。需要明确的几个理论环节是:(1)与线性雁阵模型中发达国家增长经验不同,我国经济转型的迫切性是发生在初级要素驱动的大规模工业化阶段;(2)对初级劳动力禀赋的过度使用和对内生动力的长期忽视,使得我国转型面临要素积累的增长门槛;(3)我国仍然处于劳动密集型专业化的国际分工链条上,存在向发达阶段收敛的极大不确定性。

(一)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减速的特殊性

1. 减速现象的特殊性。如图1所示,作为日本主导的东亚雁阵模型的第二梯队,过去30多年里,我国经历了劳动密集制造主导和资本密集重化工业主导的雁阵序贯,目前正处于向深加工度制造迈进的开始阶段。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于劳动力禀赋实现了与国际产业链的对接和互补,但是,鉴于国内低端劳动力的庞大规模和长期偏重于储蓄与资本积累的发展方式,我国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仍然立足于廉价劳动力,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竞争优势一直没有真正确立起来。与成功实现追赶的线性增长(如日本)不同,我国的经济减速发生在深加工度阶段之前,并导致国内产业雁阵序贯逐渐偏离线性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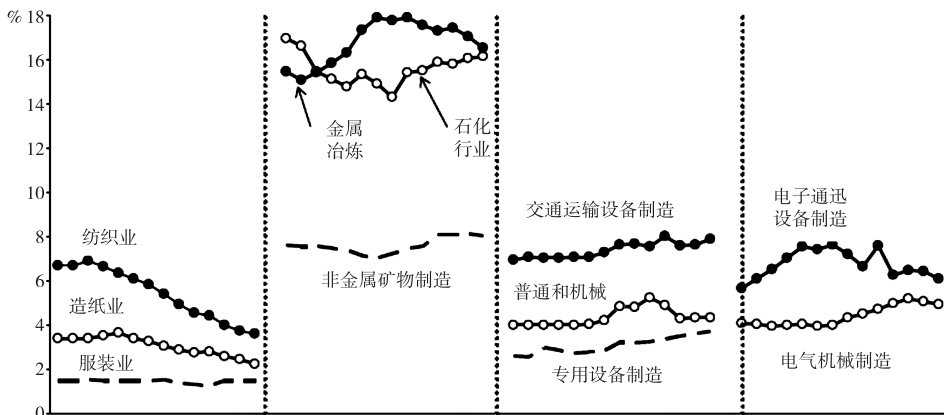


图1 2001—2014年我国工业行业动态比较优势

注：(1)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2)比较优势以制造业各行业固定资产净产值比重计算；(3)金属冶炼包括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压延，石化行业包括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 增长的外生性及其影响。阻碍国内产业结构线性升级的主要困难，在于政府作用的内生性，它的镜像在经济中的表现即是增长的外生性(袁富华、张平, 2016a)。受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我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发展战略过多局限于短期利益的追求，在注重商品生产的短期获益的情况下，要素质量改进潜力的培育被忽视。第一，就像传统发展理论所认识的那样，内生的政府干预(尤其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导致政府偏好对消费者个人偏好的替代，尽可能压低消费以获得储蓄和资本积累，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缓慢。第二，就像很多国内研究者所认识到的那样，资本资源向国有经济的倾斜，导致作为就业主阵地和创新重要源头的民营经济资本深化能力弱化。国内激烈竞争发生在劳动密集的民营部门，与基于创新和研发的竞争模式不同，不利于国际竞争优势的培育。第三，外资引进的短期利益。与日本等大规模工业化时期抑制内向FDI——以避免国内技术基础被外国取代——的战略不同，我国以自己劳动力要素禀赋大量引进内向的FDI，这从根本上抑制了国内技术基础的发展。我国未来竞争优势的技术基础扎根于何处？是外资合营？民营经济？还是国有垄断部门？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3. 消除过剩产能的被动方式。动态比较优势的要义，是通过比较劣势边际产业的向外转移，促进国内资源向技术前沿配置，这是着眼于长期增长的成功追赶经验。但重要的是，即使那些边际产业也必须是具有本国技术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或环节(只是在本国失去了比较优势)，产业转移过程也是

本国技术扩散和延伸国内生产的过程。现阶段，我国在一些领域存在过剩产能。这些过剩产能或生产环节，很大程度上是由承接国外边际产业造成的，客观上讲，缺乏过剩产能外部转移的输出口。从线性雁阵序贯的角度看，我国大规模工业化临近尾声时期“清理房间”措施显得有些局促。未来几年最可能的方式，是采取内部消化的方式被动压缩产能。

(二) 荷兰病的一般化及其在我国的表现

我国转型时期呈现的经济减速问题及其特殊性，实际上是偏离理想雁阵序贯的几条提示线索，但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比起以商品生产追逐短期利益的静态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强调长期增长过程中知识技术要素创造的重要性。以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这个最基本的指标为例，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袁富华等, 2015a)，外生性增长模式和低端产业链互补的国际分工模式，导致我国现阶段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力占比过大，低层次人力资本壅塞的问题开始困扰着国内经济调整。这也为未来经济转型带来了麻烦，经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应运而生。一类变种的荷兰病隐现在转型经济实践中。

1. 荷兰病与日本病。(1)与出口贸易相联系的国内部门兴衰效应，是标准荷兰病模型分析的目标。如甘道尔夫(2005)所述，由于冶炼部门的急剧扩张所诱发的传统制造业部门萎缩现象，被称为反工业化的荷兰病。这种现象可以在各国观察到。假设劳动为唯一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的要素，则外向的冶炼业繁荣将导致这些效

应：第一，冶炼部门生产和就业增加，传统制造业生产就业下降；第二，非贸易的内部依赖部门价格增加，国内物价总水平增加并进一步加剧反工业化倾向。(2)荷兰病的日本版本是由 Ozawa(1996)提供的，这个版本的主线是汇率扭曲和高成本导致制造业空心化。理论逻辑是：政府干预和部门分割加剧了外向的贸易部门与国内市场依赖的非贸易部门的不平衡，前者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下，后者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各种各样的保护。国内保护和管制屏蔽了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市场依赖部门(如大部分服务业行业)的竞争，结果导致了这些部门成本和价格居高不下。另外，面临激烈竞争的外向贸易部门为了抵消高成本压力，不得不持续谋求效率改善，但在保护和管制扭曲国内价格的条件下，贸易部门的利益很难得到有效保证。而且，贸易部门效率的持续改进，也带来了不利于出口的日元升值压力，结果导致日本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Ozawa(2005)认为，1985—1995年日本外向FDI的加速上升，源于这种价格扭曲效应，日本已经变成高成本国家。

2. 荷兰病的中国版本。参照标准荷兰病模型，一些文献对我国某些城市或区域特定产业过度发展导致经济萧条的问题，做出了不少有意义的探讨。我们打算提供一个稍微宽泛的视角，综合标准模型和 Ozawa(2005)的模型，给出基于动态比较优势和雁阵序贯的分析。

(1)与日本立足于自身基础技术建设而非廉价商品市场竞争的发展战略不同，我国作为承接日本边际产业国际转移的第二梯队，一开始就立足于自身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由于在增长起步之初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技术和资本深化方面差别甚大，我国大规模工业化完全分工于劳动密集型较低一端的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扭转。尽管正在处于重工业化阶段向零部件密集的深加工程度的转型时期，国内经济依然呈现着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静态格局，对于竞争优势培育至关重要的要素结构升级和知识技术创造这个核心还没有建立起来。国际分工互补对我国的最大冲击，就是过度开采、利用了廉价劳动力资源——类似于对自然资源禀赋的开发利用。时至今日，我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整体水平还不太高，这与实现工业结构快速转换所要求的要素动态完全不同。

(2)当然，如果假设廉价劳动力供给永不枯竭，这种模式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依托廉价劳动力

的商品市场迟早趋向饱和，比较成本优势也将逐渐丧失：第一，过剩劳动力吸收完毕后，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第二，人口红利窗口关闭后，廉价劳动力供给下降带来的成本上涨压力；第三，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导致低端产业链向其他新兴市场转移，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面临更大的竞争。类似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低端劳动力总有耗尽的那一天，如果不能对这种生产要素进行置换，就无从发现潜在的经济机会。更有甚者，传统结构主义理论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后果是，大规模廉价劳动力的持续使用导致了外部和内部的两种失衡，且加剧了静态比较优势的快速消失。就外部失衡来看，类似于 Ozawa(2005)的观察，外向贸易部门的低成本国际竞争及其扩张，促进了初级劳动力向出口品和持续累积的贸易顺差的转化，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反过来抑制出口部门的扩张和初级劳动力的使用，这是汇率的扭曲效应。就内部失衡来看，经济过程中内生的政府作用既出现在国有部门，也出现在服务业部门，国内价格的干预政策或许适合于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动员时期，但是国内竞争也因为这个原因受到抑制，垄断部门尤其是垄断广泛存在的服务业受到相对价格上升的冲击力度加大，这是国内价格的扭曲效应。

(3)对雁阵升级的抑制。值得注意的是，价格扭曲效应在转型时期削弱了工业部门向深加工程度化演进的潜力，破坏了服务业知识技术要素创造功能，根本上与动态比较优势的原则相违背。首先，在静态的比较优势框架下，初级劳动力的过度使用和相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增长，诱致经济资源向该产业的过度配置，阻碍技术创新部门的发展。这种资源配置效应如果被价格扭曲效应叠加，最终不仅使得核心技术竞争优势部门不能发展，而且也会导致原有劳动密集产业因为效率改进能力低下而失去竞争力。其次，城市化的高成本也会进一步削弱制造业增长潜力。正像前文所述，在制造业无法完成结构升级的情况下，房地产泡沫会消灭国内边际产业，这是技术的国际竞争优势缺失无法转移过剩产能的必然结果。再次，以规模扩张而不是以人力资本要素培育为出发点的服务业发展，无法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和制造业结构升级协同的要求。

(三)不可逆转的减速、规模经济效率终结和工业结构升级的困境

作为中国版本的荷兰病的结果，我国转型时期

正在面临的劳动生产率减速,本身是一种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课题组,2012)。图2和表1提供了规模以上制造业行业的增长与效率变化趋势。限于篇幅,这里只提供了12个代表性行业的增加值变化趋势(其他工业行业趋势类似),以及工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几乎所有行业在近几年都出现了类似于工业总体的趋势)。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给国内工业规模扩张带来了巨大刺激,工业行业增加值增长率历经了10年的急剧扩张,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大规模使用不仅创造了大量资本积累,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但是,次贷危机的冲击,却在我国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和劳动力拐点发生的当口,暴露了我国工业化模式所隐含的系统性风险。如前所述,我国经济减速的特征及其问题表明,近年来的经济减速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事件。

正如已有研究所分析的那样,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对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的创造和累积,继续筑起“高资本深化能力、高消费能力、高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优势,我国现有的增长模式,偏离这个标准较远(课题组,2016)。但是,低成本工业化的路径依赖,意味着我国将经历较长时期的调整,调整速度越慢实现门槛跨越的风险就越大。尤其是在工

业化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服务业自身的发展是否被低素质劳动力困扰、服务业替换制造业的同时能否促进整体效率改进、服务业的发展能否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效率改进等都存在很大疑问。需要防范的问题是,在国内制造业技术竞争优势建立起来之前,应尽力避免有可能被垄断和管制加剧的租金抽取趋势的发生。

四、内部化机制和服务业:我国的 城市化及其问题

二战后,发达国家经济中出现了两大创举:一是提高生活质量运动;二是把传统上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做成了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彻底改变了服务业的特性和功能。两个举措建立在工业化的效率基础上,在城市化时期成效显著。这些事件都与经济过程的内部化和生产要素动态有关,它们既是产业升级的结果,也是其进一步升级的条件和动力。

就像工业化结构升级实现了新部门对老部门替换以及新要素对旧要素的替换那样,线性雁阵序贯上居于国民经济高端的服务业也应该是基于新要素的创造,对边际制造业行业进行替换。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要素创造为核心的内部化机制,在产业结构演进和要素更新过程中悄悄发生作用,它内生于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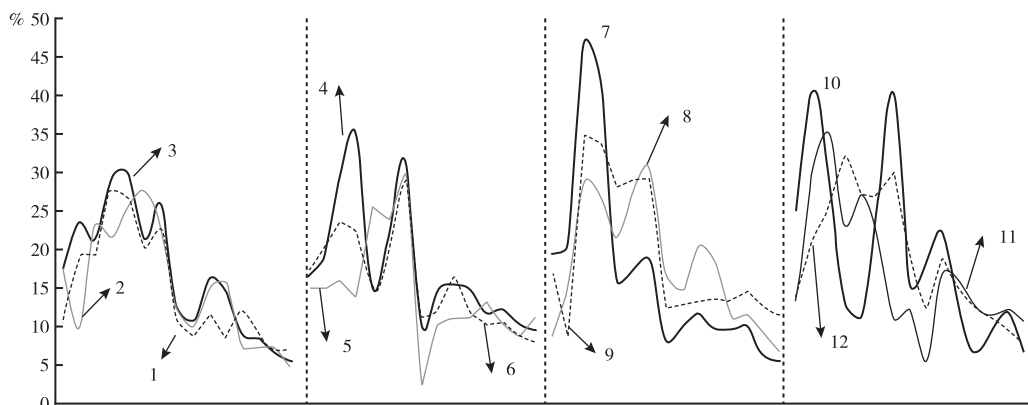


图2 2001—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行业增加值增长率

注:(1)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搜数网;(2)图中数字1代表纺织业,2代表服装业,3代表造纸业,4代表橡胶业,5代表化纤业,6代表化学原料业,7代表黑色金属冶炼业,8代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9代表有色金属冶炼业,10代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1代表通讯设备计算机制造业,12代表电器机械制造业。

表1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产出和效率总体状况的估计(%)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15.6	19.8	15.3	21.0	6.3	14.7	16.4	13.7	11.1	7.0	6.7	6.3	6.1	7.5	6.1
增加值增长率	13.1	19.1	26.1	28.4	20.3	22.5	24.7	17.8	11.0	15.7	13.9	10.0	9.7	8.3	6.1

注: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搜数网。

产和消费的联系当中,并以消费结构升级为载体促进效率改进。我国是带着深加工度化的任务迈向城市化的,长期奉行的传统结构主义理论和经济实践,在城市化这种新条件下也面临着挑战。为此,有必要从消费和生产协同角度给出一些框架性的思考。

(一)内部化与服务业

相关研究把内部化看作与知识过程建立相联系的一种资源整合方式,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对内部化机制形成了有力推动(袁富华,2016a,2016b)。内部化过程显示在发达国家产业雁阵序贯的线性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改进中^①,但是受传统发展理论影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我国——内部化机制受到了忽视。这种忽视,一方面源于外生性增长实践对资本积累的强调,另一方面源于对发达国家增长经验缺乏必要的观察和了解。与后发工业化国家比较起来,发达国家通常具有更有效率的创新能力,使得它们看起来在经济活动上更有弹性和持续的活力,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内部化机制的作用。内部化的本质是:增长不仅是看能够获得什么,还要看能够留住什么。通过消费结构升级把物质资本积累转化为人力资本,这也是发达国家两个壮举的要义。

1. 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本质上是内部化过程。借助于服务业的结构调整和知识要素的创造功能,保留住发展成果并促进技术更新换代和产业演替,这是二战后发达国家服务业新功能,这个功能的作用,促进了中心—外围国际分工互补格局的形成和演进。借助于后发国家对边际产业的承接,发达国家从两方面促进内部化机制的运转:一是国内比较劣势产业的移出,为资源向高效率生产前沿配置腾出了空间;二是通过边际产业在外围国家的运作,既可以直接获得利润,也可以通过再进口途径降低国内生产成本,降低由于服务业升级所带来的成本压力。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经济在较高的产业梯度上良性循环,保证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2. 内部化与消费结构升级。基于高收入水平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体现在消费结构的动态变化上,消费结构中科教文卫项目的支出比重的持续提高,促进了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并回馈给高效率的经济增长,这是前期研究所观察的发达国家“消费的效率补偿”问题。作为内部化运作的载体和必要的嵌入环节,消费的这种动态补偿机制,已经不同于将其作为生产最终目的的传统认识。在服务业主导的发达经济阶段,经济结构服务化也重塑了消费的功能,使

得消费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效率促进作用;前者表现在服务业中休闲娱乐行业的发展;后者即科教文卫等广义人力资本要素的培育。内部化机制一旦确立,内生增长便有了稳定的基础,同时也巩固了效率持续改进能力,这个机制一旦缺失,类似于拉美的长期停滞和经济不稳定的情景将会发生。

(二)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与租金创造效应

居于产业雁阵序贯顶端的服务业,具有非标准化、行业异质性和要素专用性等明显特征,不仅如此,围绕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建立起来的内部化过程,在密切服务业和制造业关联的同时,也在改造着制造业的特性。如果说大规模工业化时期工业以其主导地位塑造服务业的话,那么在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时期,服务业同样以自己的主导地位重塑着制造业的新特征。在服务业已经成为创新动力的产业雁阵高级阶段,经济效率的源泉也由规模经济主导演变为租金创造效应主导,两者都是报酬递增的主要动力,租金创造效应在一些时候可能导致垄断和技术竞争优势的固化——如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

Kaplinsky(2004)的多阶租金创造效应模型可以用来分析服务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升级的联动,以及内生增长动力的作用过程。其基本逻辑是:第一,基于高收入水平的消费多样性需求,是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力量,这种趋势推动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和知识创造功能的强化;与消费的多样化需求相适应,知识要素也将呈现出多样化,人力资本要素的专用性趋势越来越显著,并通过各种途径结构化到国民经济之中,促进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第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制造业、服务业在结构化人力资本和知识的同时,也在提供产品的创新和差异,垄断性收益即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并以收益投资于新知识和新要素。第三,生产的迂回程度越大,各个环节的专用要素和知识的需求也会越大,租金创造机会和效率改进的潜力也将越大。这种理解切合于发达国家二战后的创新路径,也是它们稳固自己国际分工链条上中心地位的主要支撑。

附带说明的一点是,基于服务业和内部化的租金创造,是立足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过程,根本不同于单纯依赖资源或权利的垄断收益,后者往往演变为租金抽取模式,妨害经济效率持续改善。

(三)对我国服务业和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大规模工业化接近尾声的我国,是带着突破增长门槛的巨大压力进入城市化的。但是,正如前文

所述,我国工业化路径的外部性以及路径依赖,使得不利于未来产业升级的问题频繁发生,荷兰病的中国版本也并非危言耸听。我国过度依赖劳动力禀赋、重视投资轻视消费的传统结构主义增长理念,本质上是一种短期行为(袁富华、张平,2017)。以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式实现的规模扩张,与立足于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覆盖劳动力成本(工资)较快提高的工业化方式根本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我国过去30多年倾向于劳动和资本的增长路径,在城市化时期面临的两个重大困难可以概括为:消费结构升级滞后导致知识、人力资本要素发展滞后,并抑制城市化时期服务业主导作用的发挥;内生机制缺失导致企业竞争力弱化并迫使增长偏离实体经济,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进一步削弱效率改进潜力。这两个困难为多数国内研究者所认同,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服务业的发展如果还走初级要素驱动的大规模工业化路子,只能加剧成本型服务业的增长和服务业成本病,这从根本上有悖于服务业创造知识和技术的现代功能。立足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我国城市化有待扭转的几个主要问题包括:

1. 尊重服务业的发展规律,促进工业和服务业关联。是推进让农民工进城的服务业和城市化,还是推进让就业者得到很好的技术经验和就业能力的城市化?鉴于国内外城市化的经验对比——尤其拉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之后城市发展的教训,我国城市化的稳健选择可能是后者。让劳动力获得更好的知识技能并以此增强就业能力,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发展信念,我国在这一点上也不应例外。更加重要的是,大规模工业化时期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扭转的国际分工外围地位,也需要借助城市化契机进行扭转。为此,培育服务业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创造功能,并以此为纽带实现工业和服务业的协同,才是稳步增长的路径选择。

2. 正视产业雁阵升级中的偏差,防止房地产泡沫对效率改进的挤压。我国依赖初级劳动力禀赋所获得的大量资本积累,在转型时期正在变为可持续增长的阻碍。与线性雁阵序贯的理想模型(典型如日本)不同,我国在工业化过程的深加工度化之前,就因为资本过剩导致了房地产泡沫。从雁阵序贯角度看,这种提前到来的现象,不断诱导资本远离工业实体。与工业化短期利益追求相比,这种更加短视的经济行为由于渗入了政府内生性作用,其负向冲击越来越大。消除这种负面效果以便给工业结构升级拓宽道路,估计需要很长时间。至少从问题的紧

要程度来看,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化,必须正视和缓解这个问题。

3. 我国的消费“逆城市化现象”与消费结构升级。我国的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演替相互叠加,此时,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而让消费的效率补偿机制运作起来(至少在我国的大中城市,消费者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也是合乎理论逻辑的事情。但值得关注的是,也正是在这个关节上,我国消费结构中广义人力资本相关的科教文卫项目的支出占比,在近年来却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即所谓消费“逆城市化现象”(袁富华,2016a)。这种现象的诱因复杂,消除这种问题需要更加综合的政策,无疑构成了城市化时期的新挑战。

五、结论

在从重工业化向知识技术密集的深加工度化演进的转型时期,我国同时面临着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跃升。这个现实,意味着在向发达阶段收敛的过程中,将会继续遇到有待克服的困难,挑战来自于内生动力的培育和分工中外围地位的摆脱。更加现实的任务是,把已经偏离了线性雁阵模型的增长方式,拉回可持续的理想路径上来。比起依赖低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规模工业化,我国城市化过程可持续的效率改善,涉及错综复杂的结构调整。如果调整失败,我国在全球化中完全专业化于廉价商品的分工地位固化,以及国内大规模工业化经济效率模式将向静态的租金模式退化。在城市化接替工业化逐渐成为增长主导力量的过程中,重视服务业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创造功能,并对此给出系统可行的政策措施,是避免转型时期问题恶化的努力方向。

注:

- ①工业结构雁阵三阶段演进路径包括劳动密集型阶段、重工业化阶段和深加工度化阶段,更加细致的划分请参见 Ozawa(2005)。
- ②我国经济模式的争论及一些主要观点,请参见许立成、范从来(2014)。
- ③第一,我们这里把日本学者所主张的国际国内产业雁阵理论和国际分工互补理论,称为工业化理论的日本学派。第二,拉美学派各种思想和争论,请参见 Kay(1989);对于拉美结构主义理论的引申和评论,请参见袁富华、张平(2015)。
- ④这是小岛理论中“边际产业扩张论”的观点,请参见小岛清(1990)。
- ⑤请参见 Ozawa(2005)。但是,鉴于近年来日本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有人质疑这种设想的有效性,这里对有关争论

不做太多讨论,请参见 Bailey et al(2007)。

- ⑥关于服务业增长问题的争论,请参见袁富华(2016a)。即使有观点认为不应当把服务业视为工业化分工的结果,而应该把服务业视为工业化的条件,这样的观点也属于工业部门的成本收益分析范畴——把“服务”当成一种提供商品的部门来看。针对这种传统认识,本文关于服务业要素化的认识,可能更加契合产业雁阵传递的图景。
- ⑦对于租金创造效应的论述,请参见 Kaplinsky(2004)。
- ⑧这种低素质劳动密集服务业部门相对价格提升及其诱发的鲍莫尔成本病问题,请参见奥博斯特弗尔德等(2006)。
- ⑨持续的劳动生产率改进,需要立足于内生的创新动力,即课题组(2016)所谓高资本深化能力、高消费能力、高劳动生产率这个稳定的效率三角。

参考文献:

- 弗里茨·马克卢普,2007:《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宫崎勇,2009:《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中信出版社。
- 贾恩卡洛·甘道尔夫,2005:《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莫瑞斯·奥博斯特弗尔德 若戈夫,2006:《高级国际金融教程》,中国金融出版社。
- 乔纳森·休斯 路易斯·P. 凯恩,2011:《美国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 许立成 范从来,2014:《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诠释与反思》,《现代经济探讨》第6期。
- 小岛清,1990:《对外贸易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 小野丰广,1990:《日本企业战略和结构》,冶金工业出版社。
- 姚枝仲,2014:《什么是真实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济评论》第6期。
- 袁富华,2014:《中国经济“结构双重性”问题分析》,《经济与管理评论》第3期。
- 袁富华等,2015a:《规模效率模式向租金抽取模式的退化:经济演化低效率的原因》,《天津社会科学》第4期。

- 袁富华等,2015b:《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结构: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梯度升级问题》,《经济学动态》第5期。
- 袁富华,2016a:《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分析:知识过程与增长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6期。
- 袁富华,2016b:《供给主导转向消费需求主导:长期增长过程的调整与效率模式取向》,《学术研究》第10期。
- 袁富华 张平,2016a:《中等收入阶段增长停滞的原因与增长跨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5期。
- 袁富华 张平,2016b:《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理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2期。
- 袁富华 张平,2017:《中国经济大转型:传统结构主义终结与经济结构服务化的组织取向》,工作论文。
-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经济研究》第11期。
-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经济研究》第12期。
-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第11期。
-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6:《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经济研究》第10期。
- Bailey, D. et al (2007), *Crisis or Recovery in Japan*, Edward Elgar.
- Kaplinsky, R. (2004), “Sustaining income growth in a globalising world: The search for the Nth rent”, Centre for Research in Innovation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Brighton.
- Kay, C. (1989), *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Routledge.
- Ozawa, T. (1996),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the ‘Japanese disease’: The conundrum of manage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0(2):103—113.
- Ozawa, T. (2005), *Institution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Japan: 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of Catch-up Growth*, Edward Elgar.

(责任编辑:何伟)

(校对:谭易)